

中国梦理论:中国国家话语的新形态^(*)

○ (意) Beatrice Gallelli^{1,2}

(1.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2. 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 意大利 威尼斯 30123)

(摘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理想的新概括,这既是一种政治理论,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国家话语的新趋向。“中国梦”富有深刻的修辞内涵和全球意义,投射了中国的国家价值取向,引领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走向。从学理角度阐释这一国家隐喻的修辞建构,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及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角色。本文试图从国家传播学、国家修辞学、国家话语学等视角探索“中国梦”的概念意义、文化意义及其在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认为,“中国梦理论”体现了中国政治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型,拓展了政治话语在民间的话语空间,在国际上体现了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全球性思维。

(关键词)“中国梦”;修辞;国家意象;话语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7.02.012

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中国梦”,适逢中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世界形势也面临着大变革。在世界秩序重构时代,中国进入了“新常态”⁽¹⁾。“中国梦”富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丰富的修辞内涵,它向世界投射了中国的国家价值趋向,也引领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在国内外的走向。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国家软实力的提高,还是国内舆论的调控、国民凝聚力的增强,“中国梦”无疑都

作者简介: Beatrice Gallelli (白美颐), 中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进修生, 意大利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博士生。

(*)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指导下所做的研究, 其中引述了陈教授著作和课程中的许多观点, 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本文中的部分观点曾在《论中国梦的修辞性建构》(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年会, 浙江绍兴, 2016年4月9日)、“‘Dynamic China’ British Postgraduate Network for Chinese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 2016”等论文中提及, 本文对上述相关论点做了进一步补充完善。

是中国在发展的新形势下所采取的新策略。本文尝试对“中国梦”的中国国家话语价值做一简要的分析和阐发。

一、“中国梦理论”:一种国家隐喻

“中国梦”是中国国家修辞的新形态。“所谓‘国家修辞’就是以国家为修辞主体,以建构国家形象、处理国家事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的修辞行为和现象。”⁽²⁾“国家修辞是国家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³⁾国家修辞“不仅涉及国际事务处理,同时也涉及国内事务处理。”⁽⁴⁾国家修辞具有建构中国国内外形象的作用和功能。中国的领导人把中国的发展理想,把中国的民族复兴梦想比喻为一个“梦”,因此说,“中国梦”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国家隐喻,是中国国家修辞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隐喻”为人类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新方法和看待事物的新视角,还能创造新的意义,表达新的思想。作为一种国家隐喻,“中国梦”也是中国的一种国家修辞策略。隐喻可以增加话语的感染力,但它不能独立于其他的修辞手段和方法。⁽⁵⁾作为一套政治话语,“中国梦”是一个有机体,既包括“中国梦”本身的隐喻,又包括其他隐喻以及成语、格言、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和方法。为此,本文以概念隐喻为出发点,试图对以“中国梦”为主的当下中国修辞战略予以阐释。

“中国梦”的修辞建构中,有两个根本隐喻,即旅程和战争隐喻,其被用来清晰地、具体地组织“中国梦”的概念。这两个隐喻都不是由当下最高领导人提出的,而是中国政治修辞话语的两个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战争隐喻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当中出现的频率有所下降,但是,当需要凝聚人心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将其作为动员群众、团结民众的一种方法。⁽⁶⁾在“中国梦”话语组织的过程中,战争概念域是通过很多的表达方式呈现的,如在“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⁷⁾“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⁸⁾中,“战线”和“主力军”二者都属于战争域。

“旅程隐喻”着重表明“中国梦”与“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⁹⁾

在本例中,旅程隐喻和比拟部分凸出:把通常描写人的“精神”“力量”“魂”都用于描写中国国家。因此,这里是把“中国”比作一个人来阐释;而属于旅程概念域的“走”“道路”则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由此推论,“旅程”则构成了“中国梦”这一概念。最后的两个分句“魂无定所、行无依归”是对偶,不但结构格式(名词+否定词+名词)相同,而且语音和谐,进一步突出了“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有助于使国民熟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

个隐喻都有利于强化人民的归属感。旅程隐喻把人们都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把国家比作人本身则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此观之,“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这两个范畴是相辅相成的,都“力图为国民提供一个灵魂的栖息地”。⁽¹⁰⁾

自2012年以来,中央在丰富“中国梦”的内涵和意义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新修辞范畴。比如“补钙论”和“扣扣子理论”,这也是两个隐喻,它们形象地促进了国民价值观的形成。“补钙论”指的是:“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补钙’”。一个精神上“补钙”的人,是不可能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的。⁽¹¹⁾“扣扣子论”是指:“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¹²⁾“补钙”和“扣扣子”这两个范畴体现了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型,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了实现“中国梦”与国民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密切关系。

在对“中国梦”内涵的阐释中,也运用了一些传统的修辞手段和方法,比如引经据典。以往,中国的领导人也用典故、用名句,以持之有故。但是,据国际媒体报道,“用典”已成为一种“习式风格”。⁽¹³⁾由此可见,习近平是想把“中国梦”范畴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使“中国梦”成为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的国家理想,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不过,在倡导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在大力强调“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别,⁽¹⁴⁾以阻止“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越发重视,尤其是不久前《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印发,西方价值观念多年来在中国广为传播所造成的危害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¹⁵⁾这表明,中国价值无论是现代的意识形态,还是华夏的文明积淀,都是与“西方价值理念”对立的。不过,“西方价值观念”是什么样的价值?“西方”是什么意思?“东西方”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萨义德在“东方学”⁽¹⁶⁾中指出,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积累的那种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认识日趋严重。而最近涌现出了一种“西方主义”的现象,同样是一个存在于诅咒与想象中的伪命题。正如陈汝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西方’‘东方’对立思维,是一个虚拟命题,是真的‘假球’,没有球网,也无法实现进球。”⁽¹⁷⁾

二、“中国梦理论”:中国精神的新形态

“中国梦”作为国家战略的一种话语表达形式,具有怎样的战略目标呢?这需要放置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伦理道德和国家价值体系中加以认知。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领先世界,但是,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引出了新的问题,需要面对许多新的挑战,比如目前中国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和国民所面临的精神困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虽然国家物质硬实力越来越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们的“物欲”也随之膨胀,国民精神空虚现象明显,全民的公共价值认同减少。因此,建立一种新的共同道德价值认同是当务之急。“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背景,它反映了中国国家精神的新形态、新方向。

那么,什么是“中国精神”?⁽¹⁸⁾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历史一般被描写为一条从未断裂的链条,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再到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朝,乃至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被看成是一种朝代的循环。不过,原来所谓的“中国”指的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指众多比较小型的国家。比如,《战国策》就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这表明“中国”并非一个国家。因此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尽相同,尽管有相似之处。

如果说“中国”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一判断虽然确定了国家地理以及政治体系等概念,但忽略了文化的方面;“中国”关涉文化的传统,但其边界有所模糊。由此,我们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历时的概念,又是一个共时的概念。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内涵和特征有所不同;且在相同的时代,“中国”这一概念在人们的意识空间当中有多种形态。因此,“中国精神”很难被明确地定义下来,它同样也是一个历时和共时的概念,是被话语建构出来的。

1949年以来,在从西方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中国精神”被构建出来。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基之一,但是,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导致它与当下的中国现实有些离散。“马克思主义”这种单独叙事无法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提供合理的阐释。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构想。⁽¹⁹⁾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也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²⁰⁾“中国梦理论”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和载体。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可以说是这种价值观的话语呈现。“中国梦”是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道德层面,融合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和现代智慧,彰显了“天下家国”的大义。⁽²¹⁾“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恢复了华夏文明的历史积淀,指引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塑造了中国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内涵。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梦理论”是中国精神的一种新形态。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梦”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向“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

用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更需要依托博大精深的华夏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由于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前中国的外交策略开始从“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韬光养晦”的战略由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从那时起,它就引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稳步前进。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当前的中国已经抛弃了相对低调的姿态,采用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有学者认为这两种战略的主要区别在于“韬光养晦”注重经济利益,而“奋发有为”强调政治支持。^[22]

由此观之,“中国梦”的话语拥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精炼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其杂糅了西方的传统话语,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对立。当然,消除了政治观点上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价值观上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三、“中国梦理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新景观

“中国梦”体现了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新景观。最近几年,“国家话语体系构建”成为中国政治理论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013年,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3]“中国梦”可以说是中国国家话语体系的旗帜,是一个融通中外的新表述,其融合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建立了中西方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是,什么是国家话语体系?其重要性在哪里?从学术的视角看,所谓“中国话语”就是以中国国家为话语主体的话语。“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24]国家话语并非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国家的政治方略,中国国家话语堪称整个中国国家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国家话语主体除了包括政党、政府以及其领导人等在内的高层主体,同时也包括国民在内的下位主体。国家话语的主体就是那些具有国家传播功能的主体,无论是媒体、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国家话语的传播者。

国家话语“既是一个历时概念,也是一个共时概念”。^[25]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国家话语,其内涵、结构、功能都不同,但是,它们都能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现实,又能体现国家的政治方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阶级斗争”等都是中国国家话语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距离的拉近、新媒介技术的普及,中国国家话语不同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加剧,导致中国国家话语发生了变化。

作为中国国家话语的组成部分,政治话语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呈现出新的表达方式。政治话语调整了它的内涵、结构,以引领中国国家话语主体的合唱,同时协调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话语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国家政治话语从

“共产主义”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目前的“中国梦”等概念转变。这表明“中国国家话语”与时俱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谐社会”则促进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梦”则指出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伟大目标。

但是,为什么中国执政党采用“梦”这种修辞形态来指称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宏伟目标呢?“梦”本身是一种潜意识活动。就像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那样,在中国文化中,“梦”也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的想象。中国的“梦文化”源远流长,与“梦”相关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从先秦时代的“庄周梦蝶”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梦”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启示源泉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梦”被赋予了一些隐喻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梦”具有双重意象,既有褒义,也有贬义。一方面,它指梦想、志向、抱负或者理想,即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它也指不切实际的幻想、妄想,比如“白日做梦”“痴人说梦”“南柯一梦”⁽²⁶⁾“黄粱美梦”⁽²⁷⁾等等。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梦”既指乌托邦、办不到的事,又指“梦想”,是通过努力可达到的目标,可实现的理想。那么,“中国梦”是哪种梦呢?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看来,“中国梦”无疑指的是一种理想和抱负,是一个东方大国的国家梦想,是中国话语的新景观,它具有丰富的语义空间。

不过,虽然“中国梦”体现了中国话语的新趋向,但习近平的“中国梦理论”,同时也融合了以往的目标。习近平阐释了“中国梦”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梦想”。⁽²⁸⁾“复兴”这个词语富有深刻的语义内涵,意味着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且涉及“勿忘国耻”的叙事。以往,中国领导人曾经用“复兴”来标志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开始,用“百年国耻”来激励中国人民支持革命或改革。⁽²⁹⁾与以往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在于中国人能在具体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具体说,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涵盖了所有的以往目标。

“小康”和“和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小康”语出《礼记·礼运》,在儒家思想中指实现“大同”之前的社会阶段;而“大同社会”则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用“小康社会”概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³⁰⁾从那时起,“小康社会”就成了一种政治修辞话语。“和谐”是胡锦涛所倡导的政治话语,“和谐社会”则是上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理论”是继往开来的,它既是以往国家话语的延伸,也体现了中国话语的新趋向。

四、“中国梦理论”:中国国家传播的新策略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规模的不断拓展、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人民生

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国越来越重视国家的传播能力。中国国家传播并非只是提供国家信息的传播行为,而且“是国家制度、国家意志、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和国家文明建构与传播的重要手段”。⁽³¹⁾特别是在从“经济大国”转向“文化大国”的过程当中,中国国家传播具有战略性的作用和功能。由此角度看,对外传播的“中国梦”是中国国家传播的新策略。

“在中国参与、影响甚至主导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梦的功能就是要形成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形成具有世界性的理论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提供指导和鞭策。”⁽³²⁾由于“中国梦理论”吸纳了西方的“梦想修辞”传统,弱化了中西之间的话语隔膜,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对立,“中国梦”以及“世界梦”等说法本身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形态”,能“服务于人类文化的沟通”。⁽³³⁾“中国梦理论”也展现了当下最高领导人的全球性思维,体现了中国国家传播的新趋向。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以“和谐世界”为主要旋律,该主题反映出中国国家传播战略有所转型,但“中国梦理论”则更进一步地推进了这种转型。虽然“中国梦”是“和平崛起”话语的延续和发展,但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国家传播呈现出一批新的修辞话语范畴。

首先,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推动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美国等国“新型大国外交关系”的构建,正如新闻所报道的那样:“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³⁴⁾这表明,虽然中国仍然位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却有所提升,获得了“新型大国”的话语权。

其次,除了加强伙伴关系外,最近几年,中国通过一批积极的话语范畴,如“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大力促进了与各国的多边合作,且由此引领了新话语场的形成。

最后,在不同的场合中,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倡“完善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³⁵⁾这表明,在全球格局不断裂变、世界秩序重构的大环境背景下,中国在批判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促进了一种治理全球关系新方法的形成。杭州G20峰会不但证实了一个新世界秩序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建构了。

当然,那些迄今为止领导了全球合唱的传播主体,对一个日渐强大的新兴国家必然会有防备之心。例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演讲中,就曾多次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令国际产品的竞争力加大,并使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亦将中产阶级薪酬水平无法提高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很显然,对于那些参与构建与传播“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来说,在国内公共舆论中将中国塑造

成一个潜在敌人的做法,其背后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另外,发达国家总是用“人权”问题来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中国重申中国永远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因此,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要解决跨文化传播中仍存在的冲突和矛盾,未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梦”体现了中国国家传播的新策略,开启了中国政治话语的新时代,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年,中国正以‘中国梦’‘亚洲梦’‘世界梦’……等新的修辞方式,引领传统与现代智慧、古典文明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引导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引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36]法国、俄罗斯、韩国等许多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国家隐喻,成为了中国所倡导的全球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国内来看,“中国梦理论”则体现了官方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型。“中国梦”所创造的修辞意象无疑更具有感召力,但也带有一定的指令性色彩。因此说,“中国梦”隐喻可以说是替代了邓小平有名的“白猫黑猫”隐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比喻,一度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而目前的“中国梦”比喻则为国民提供了看待中国未来的新视角,同时也消除了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争论,因为这一条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智慧的途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路线。

注释:

(1) 所谓的“新常态”指的是新的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消费需求要成为主体,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 [3] [4] 陈汝东《论国家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第15、16、16页。

(5) 有学者已经提出,概念隐喻的分析不能离开对其他修辞手段和方法的剖析。参见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Politicians and Rhetoric: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Metaphor*,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6) Perry Link,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52.

(7) [8]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9)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10) 陈汝东《论国家价值传播——视觉叙事范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415页。

(11) 韩振峰《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光明日报》2015年5月4日第1版。

(1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

(13) 张远晴《习得修身篇——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5月8日第5版;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以及最近在人民电视播放的《习近平用典》政论微视频。

(14) 《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求是网, <http://>

www.qstheory.cn/dukan/qs/2016-04/15/c_1118593638.htm,2016年4月15日。

(15)朱继东《社会主义大学不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何错之有》,党建网,http://www.dangjian.cn/sy/jjq/zxdjxx/201502/t20150201_2431587.shtml,2015年2月1日。

(16)Eduard W. Said, *Orientalism*, Penguin Group, 1978.

(17) [31] 陈汝东《国家传播学》,《北京大学博士生课程“国家传播学”讲义》,2016年,第116、7页。

(18)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界定,但有人界定过“民族精神”,比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支撑和促进民族繁荣兴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品格气质、心理情感、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的总和。”参见赵存生《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页。

(19)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20) [23]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2013年8月20日。

(21)语出《孟子·离娄》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2)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第1-35页。

(24) [25] 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8、70页。

(26)“南柯一梦”语出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比喻一场空欢喜。

(27)“黄粱美梦”出自唐·沈既济《枕中记》,形容虚幻不能实现的目标。

(28)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9日第1版。

(29) Wang Zheng, The Chinese Dream: Concept and Contex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No. 1 (2014), pp. 1-13. William A. Callahan, What can China Dream “Do” in the PRC, *The Asan Forum*, 2014-12-8, http://www.theasanforum.org/what-can-the-china-dream-do-in-the-prc/, Vol. 4, No. 5 (2016). 关于“勿忘国耻”叙事在当代政治话语当中的角色,参考: Wang Zhe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王洋《从儒家社会理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小康思想发展历程的探析》,《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第80-82页。

(32)贾文山、赵立敏《“中国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图——对中国学者的“中国梦”研究综述和批评》,《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

(3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34)《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第1版。

(35)《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第1版。

(36)陈汝东《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4-94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